



# 汉语拼音化的反思

苏培成

**提 要** 清末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微,出现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社会思潮。民国时期研制的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未能代替汉字。西方学者提出的“表形—表意—表音”文字发展总规律,得不到有力的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把拼音化作为文字改革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顺应社会的发展,1986 年做了调整取得了成功。汉字和拼音文字各有优点和缺点,平行发展,互不隶属。用汉字记录汉语优点大于缺点,汉字将继续使用,为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交际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汉字 意音文字 拼音文字 汉语拼音化

汉语拼音化与汉字拼音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汉语拼音化着眼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研究不同性质的文字记录同一语言的差异与得失。汉字拼音化把语言抛在一边,只研究文字符号的发展与交替。本文采用汉语拼音化的提法。汉语拼音化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叫“文字改革”,1986 年以后逐渐改称“语文现代化”。

## 1. 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说文解字·叙》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康熙字典·序》说:“《易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保氏》‘养国子教以六书’,而考文列于三重。盖以其为万事百物之统纪,而足以助流政教也。”这表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汉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字是汉族祖先创造的自源文字,从甲骨文算起已经有三千四百多年历史,它的实际寿命自然还要长得多。作为交际工具,汉字记载了中华古国的文明史,传承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复杂的方言分歧,汉字具有超方言性,成为方言间沟通的工具。汉字具有调节功能,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和社会交际的需要,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稳步发展。





在古代没有出现贬低或废除汉字的思潮。不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南北朝分裂割据时期,我们的先人没有把国家的兴衰和汉字的功过联系在一起。在古代汉字不止一次与拼音文字发生接触。南北朝时期流行过梵文和鲜卑语。在唐代的敦煌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外族文字,如吐蕃文字、回纥文字、吐火罗文字等。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建立了统治全国的政权,他们都有自己的拼音文字。在这种语言环境下,没有出现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相反,从很早时候开始,汉字就传播到周边的民族,形成了广大的汉字文化圈。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提出汉字不如拼音文字的看法:“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但这种看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 2. 文字改革的提出和发展,成为强有力的时代思潮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甲利兵打破。西方传教士以通商口岸为中心传播《圣经》。面对不识字的民众,他们设计了方言罗马字,用来翻译《圣经》教民阅读,很快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教会罗马字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少有17种方言罗马字在传习。据统计,1891年至1904年,罗马字《圣经》的总销售数达137870部(倪海曙,2016:18)。传教士在倡导教会罗马字的同时,开展对汉字体系的批判。他们认为:“目前那繁难的书写方法,必须彻底让位给那更实用,更少图形化,用罗马字母来代替的拼音制度。”“罗马字在横的方面看来可使思想的传达迅速。中国语言中繁难的方块字是二十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中国现行的文字对于中国青年彻底的科学化教育,是一种最有力的障碍。”(倪海曙,2016:17-18)这是殖民主义者的汉字观。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西方文化蜂拥入中国,是时出现了“全盘西化”的主张。“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梁启超,1998:72)文字改革思潮随之兴起。爱国人士寻找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着眼于把中国和西方列强进行对比。他们认为中国贫弱在于教育落后,而教育落后又源于汉字落后,于是立志要改革汉字,主张废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时代思潮云涌波诡,在清末出现了文字改革的切音字运动。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懋章用他自己设计的字母出版了厦门方言的拼音课本《一目了然初阶》(切音新字厦腔),开始了晚清的切音字运动。从《一目了然初阶》出版到辛亥革命发生的二十年当中,清末学者提出的切音字方案有28种,平均每年一种以上。切音字运动





提倡者的基本观点是富强由文字,认为汉字的繁难造成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卢戛章(1958:1)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他们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劳乃宣(1958:80)说:“是故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切音字的倡导者提倡拼音文字,但并不主张废除汉字。劳乃宣(1958:81)说:“……中国六书之旨,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华文不可。”民国政府成立后,并没有采取切音字运动的主张,推行切音新字,而是在1913年召开读音统一会,审定国音,制订了注音字母,准备推行国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字改革的思潮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强化。这时从西方传来了文字演变的三阶段论,就是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这个理论成为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武器。傅斯年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中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华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华文。”1923年,也就是注音字母公布后的第5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sup>①</sup>,汉字革命和采用罗马字母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在“汉字改革号”上,钱玄同发表的《汉字革命》成为讨伐汉字的檄文。他断言:“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钱玄同还从六书的演变里总结出汉字发展的规律。他说:“照这六书发生的次序看,可知汉字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了纯粹表音的假借方法发生,离开拼音,只差一间了。”这些偏激的言论无法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国语统一筹备会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拟订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可是教育部不肯公布,一直拖延到1928年9月26日,才由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公布。当初拟订的是拼音文字,而公布时却改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行政当局采取的是审慎的做法。

1931年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在海参崴举行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简称“北拉”)。这个方案不标声调,不拼共同语,只拼方言。理论上存在缺陷,但学习比较容易。北拉于1933年传入中国,被裹进

---

<sup>①</sup> 据刘静在《黎锦晖与〈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中考证,《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版权页的出版日期是1922年8月20日,实际出版发行时间为1923年5月26日,参《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4期。





政治斗争的漩涡,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禁止,而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得到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从1941年1月1日起,新文字跟汉字有同样的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决定研制新的汉语拼音方案,北拉停止推行。

就在国内汉字革命和采用罗马字母的呼声达到高潮的时候,从国外传来了不同的声音。192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的《中国语与中国文》。高本汉(1931:50)说:“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决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他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伏于他人了。”在这段话里,他提出了不赞成汉语拼音化的两点理由:一点是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非常适合,另一点是改用拼音字母就把中国文化的基础废弃了。

### 3. 对清末至民国时期提出的文字改革的理由的辨析

这个时期提出的文字改革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下面略加评析。

(1)汉字难学。汉字数量很多,结构复杂,没有完备的表音系统;而拼音文字只有几十个字母,字母结构简单,拼音比较规则,见字可以知音。从这几点看来,汉字比拼音文字难学,可是我们不能仅根据这几点就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因为汉字还有许多优点,所以必须全面地研究,综合考虑,才能决定是不是要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

(2)富强由文字。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国家的贫富或强弱,是由社会制度、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教育制度、历史情况等因素决定的,不是由文字的状况决定的。当今世界上,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并不是都富强,有些也很贫弱。旧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而新旧中国使用的都是汉字,可见国家的强弱与使用什么样的文字没有直接的关系。

(3)汉字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这是苏联马尔学派的错误观点。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用上层建筑作为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但文字不是上层建筑,不是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汉字和拼音文字都是全民的交际工具,没有阶级性。它们既可以传播正确的思想,也可以传播不正确的思想。使用哪种文字与文字传播什么思想并不相关。

(4)汉字不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有的科技得到了发展,有的科技不发展。旧中国科技不发展,新中国科技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科技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位居世界前列。1980年,中国是世界上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新旧中国使用的都是汉字。





(5)由象形而表意而表音,是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认为,世界文字的发展不存在这样一条共同规律。汉字和拼音文字属于不同的文字体制,难分高下,互不隶属,汉字不会发展为表音文字。对这个问题,下一节还要做些讨论。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字改革方针的确立和调整

五四以来的文字改革思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有很大的影响。1951年毛泽东主席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吴玉章,1955:14)。这是新中国为汉语拼音化确立的方针。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根据上述报告形成了新中国文字改革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的任务是实现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第二步实现汉字拼音化,改用拼音文字。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对文字改革的不同声音。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有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汉语拼音化提出了质疑。在这里我们介绍唐兰和陈梦家的意见。

早在1949年之初,唐兰(1979:112)就指出:“中国文字果真能摒弃了行用过几千年的形声文字而变为直捷了当的拼音文字吗?一个民族的文字,应当和它的语言相适应,近代中国语言虽则渐渐是多音节的,究竟还是最简短的单音节双音节为主体,同音的语言又特别地多,声调的变化又如此地重要,在通俗作品里含糊些,也许还不要紧,用拼音文字所传达不出来的意思,只要读者多思索一会,或者简直马虎过去就完了。但是要写历史,要传播艰深的思想,高度的文化,我们立刻会觉得拼音文字是怎样的不适于我们的语言。”唐兰(1949)在这之后发表的文章里说:“文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文字易于学习,但改革文字必须注意到中国具体环境。中国语言同音字众多,改用纯粹的拼音文字是不可能的。考虑到汉字是承载着过去的历史文化,完全废除汉字更是行不通的。”

陈梦家(1988:644)说:“中国文字(汉字)发源于图象,逐渐的经过简化和人意的改作成为定形的简省的概略的象形,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它是在汉语的基础上成长而发展的。汉语是单音缀的、孤立的、分析的。所以汉字是一字一音缀的,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句子中可以用作不同的词类,一个字在一个句子中只表示一个单纯的意义。汉语决定了汉字,也决定了汉语法,即语序在句子中的重要作用。汉语也决定了中国文字长期的停留在象形的形符系统上而没有走上音符文字的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人们对文字改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1979年





5月,倪海曙(1991:114-115)在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的发言里说:“过去说,文字不改革,不能扫盲,不能普及教育,好像文字改革与扫盲和普及教育之间有个必然的关系。现在又说文字不改革,不能实现现代化,也肯定文字改革与现代化之间有个必然的关系。但是这样说,是不是太笼统了?是不是缺乏分析?人家可以反驳你: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文盲也很多,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了文字改革的国家,文盲也并不少,例如土耳其。可见这是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问题,与文字改革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有关系的是效率高低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也一样。有些国家,文字没有改革,例如日本、南朝鲜(韩国,引者注)等,也现代化了。而有些实行了文字改革的国家,例如蒙古、印尼、越南等,却还没有现代化。文字改革与实行现代化的关系,恐怕也是效率上的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片面地说汉字坏,人家不服气的;片面地说拼音文字好,人家也不服气的。汉字有它的优点,拼音文字也有它的缺点。一定要全面地来看,有分析、有比较地来说,才符合实际。”倪海曙的意见难能可贵,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至于倪先生说的文字改革可以提高效率,似仍可商。

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对文字改革方针做出了调整。1986年1月6日至13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并贯彻中央提出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关于汉字的前途,会议重申周恩来1958年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里的观点:“我们认为,周总理的这段话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刘导生,1986)

会议没有重申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对此胡乔木(2015:323-324)在闭幕式的讲话里做了解释:“有些同志可能会想到或者感觉到,在这次会议上有些东西没有能够得到肯定,甚至于还好像失掉了什么东西。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和文字改革的工作者,我可以真诚地向大家说明:我们没有失掉任何东西,相反地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老同志、老前辈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任何遗憾。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次会议并没有妨碍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各种实验工作的继续进行,也不影响各方面实际工作的开展。相反,它是要求我们加强研究工作、实验工作和在人民群众里进行更多的宣传、推广、实践工作的。”我们认为1986年对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调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 5. 对汉语拼音化的新思考

1986年12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召开了汉字问题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谈了新的认识。陈原(1988)说:“汉字这种书写系统是同汉语这种语言系统相适应而生存和发展的……”“近年来对汉字的研究,应当说是有所进展的,甚至可以说有很大进展。”“首先,汉字的定量分析得到许多令人鼓舞的数据。”“其次,对汉字的研究分析已越出了传统文字学范畴,很多学科对汉字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第三,从适应实际应用的需要,对汉字规范化和汉字习得学打开了新的天地。”

吕叔湘(1988)对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利弊得失做了比较:“第一,无论是汉字还是拼音字,它的优点和缺点分不开,有这么个优点,就不免有那么个缺点。第二,汉字的优点恰好是拼音字的缺点,汉字的缺点也就是拼音字的优点。”吕先生的看法否定了拼音文字比汉字更发展、代表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的看法。

对文字发展三阶段论也有学者进行了思考。早在1957年,周有光发表了《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引进了西方学者关于文字演进的理论。他说:“文字发展史的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从‘文字画’和‘图画字’开始,一直到表音符号萌芽,表达方法是表形兼表意,不是单一的表形。第二阶段,在运用表意符号的同时,表音符号日益发展起来,跟表意符号结合运用,一直到拼音文字诞生,表达方法是表意兼表音,不是单一的表意。第三阶段,是拼音文字阶段,从音节文字到音位文字,表达方法以表音为基础。这三个阶段的文字是三种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字制度。”“仅仅就汉字的演变来研究文字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得到拼音文字是比意音文字更优越的文字制度这样的结论。拼音文字的优越性和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只有在人类文化发展史当中进行文字制度的比较研究,然后才能够科学地认识。”

周有光(1998)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论述,他把表形、表意、表音三阶段改为形意文字、意音文字和字母文字,并以两河流域丁头字的演变为例说明文字演变的三阶段论:在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朝代、亚述帝国时代,丁头字是意音文字;到了新埃兰向音节化前进;到了乌加里特实现了音素化。周有光(1998:273)有一段重要的话:“人类学中有一个‘失去了的环节’(missing link):猿和人之间的中间环节还没有找到。文字学中也有一个‘失去了的环节’:意音文字和字母之间的中间环节还没有找到。”这就是说,意音文字如何演变为拼音文字并未得到证实,也许在文字学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中间环节”。对西方的文字演变三阶段论提出了保留意见。既然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能成为科学的结论,我们也就不能认为汉语一定要拼音化。

按照文字演变的三阶段论,汉字要演变为拼音文字,可是汉字使用了三千多年,至今并没有变为拼音文字。这是为什么?周有光(1998:21)的解释是:“文字制度的





重大变化都是在文字传播到异民族以后才发生的。在原民族中间虽然经常发生形体的量变,可是不容易发生结构的质变。传播到异民族中间以后,遇到了新的矛盾,由此引起新的创造。异民族对外来的文字,没有原民族那样固执的图腾习惯。”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人们很难相信汉民族具有的所谓的“固执的图腾习惯”竟然在三千多年里一直阻碍汉字演变为字母文字。按照这样解释,不正是说明汉字在本地不能演变为拼音文字吗?我们认为,文字演变的三阶段论不能成为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理论根据。

文字演变的三阶段论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字如同文化一样有高低之分,代表三种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字制度。意音文字是较低水平的文字,拼音文字是高水平的文字,所以作为意音文字的汉字要演变为拼音文字。我们认为这种理论没有事实根据,它反映的是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学者的主观愿望。汉字和拼音文字都能够无遗漏地按照语词的顺序记录语言,都是发达的文字。这两种文字平行发展,可以互相借鉴,但互不隶属。不同语言根据自身具有的特点,可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在语言的特点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在没有政治因素强行介入的情况下,文字体制不会发生质的改变。

## 6. 文字的体制要适合语言的特点

用汉字记录汉语有优点也有缺点,总起来看是优点大于缺点。这是因为汉字比较适合汉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汉字的最大的优点是能够通古今、通四方。古今字音差别很大。但由于字义的变化比较小,而且两千年来汉字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言差别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汉字的这个特点对于文化的延续和继承,对于说不同方言的人之间的交际和理解,具有重要的作用。”(朱德熙,1988 :14)如果改成拼音文字,汉字通古今、通四方的优点将丧失殆尽。

(2)“汉字的另一个明显的优点是能够区别同音词。所谓区别同音词,严格地说就是能确定不同的语素。当我们听到一个不熟悉的科学术语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指的什么,可是写出汉字来,就会对我们理解它提供一点启发或线索。我觉得从小就跟汉字打交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一种对汉语作语素分析的习惯。”(朱德熙,1988 :14)汉语里同音词很多,文字上必须加以区分。如果改为拼音文字,要把同音词区分开来,其繁难的程度要比汉字还严重,根本无法应用。

(3)汉字带有丰富的汉文化。例如,我国古代曾用贝壳作为等价交换物,所以许







多表示财物的字带有意符“贝”，如“货、财、资、费、贵、贱、贿”等。意符“示”来自古代的神主，许多表示祭祀、神鬼、祸福的字多带有意符“示”，如“祉、祀、神、祖、祸、福”等。拼音文字只表音，不表意，如果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则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无法继续，是重大的损失。此外还有以汉字为对象的许多民族艺术形式，如书法、篆刻、字谜等，独具特色。逢年过节贴春联、贴福字，是不可缺少的民俗。在人们心里，识字就是有文化，人们敬仰文学家、书法家。以汉字字形为载体还形成了一批词语，如“十字路口、丁字尺、八字胡”等。正因为汉字有如上的优点，几千年来汉族民众热爱汉字，对汉字寄予了深厚的民族感情。

(4) 汉字有悠久的历史，汉民族生活在汉字的海洋里，即使从甲骨文时期算起也有三千多年历史。它深入汉民族的内心，如同血肉。在清末以前，人们并不觉得汉字难学，没有改革汉字的要求。侨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见到汉字如同见到祖国的亲人。对于抛弃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巨变人们无法接受，将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汉字也有自己的缺点：(1) 数量繁多，异体字繁多；(2) 结构复杂；(3) 缺乏完备的表音系统；(4) 多音多义字要靠上下文来分辨，容易误读；(5) 国际文化交流困难。对于这些缺点，我们可以通过文字规范逐渐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对汉字进行了整理和简化，汉字学习的繁难程度有所减轻。许多汉字不能准确表音，我们已经有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汉字的工具，用于汉字不能使用或不便使用的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为汉字的方便使用，开辟新的道路。

汉语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记录，将改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语文生活，这是民众无法接受的，它带给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将是灾难性的。从国外的经验看，阿塞拜疆把基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后，原来用基里尔字母书写的多数技术文献都被废弃了。乌兹别克斯坦由基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的进程十分困难而且漫长。<sup>①</sup> 这还是由一种拼音字母改为另一种拼音字母。如果把汉字改为字母文字，困难程度还要大许多。全面权衡利弊，用汉字记录汉语优点大于缺点，汉字将继续使用，为社会的发展和交际起到积极的作用。

#### 参考文献

[明]方以智《通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梦家 1988 《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

---

<sup>①</sup> 参见《哈萨克斯坦将改用拉丁字母——专家解读信号意义》，《参考消息》2017年4月14日第3版，摘自俄罗斯《独立报》2017年4月13日报道。





- 陈原 1988 《把汉字问题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
- 傅斯年 1919 《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
- 胡乔木 2015 《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 梁启超 1998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 刘导生 1986 《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语文建设》第1、2期。
- 吕叔湘 1988 《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
- 倪海曙 1991 《加强文字改革工作的科学性》,《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 倪海曙 2016 《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 钱玄同 191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
- 钱玄同 1922 《汉字革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
- 唐兰 1949 《中国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和推进文盲教育儿童教育两问题的联系》,《人民日报》10月9日。
- 唐兰 1979 《中国文字学》新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 1958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
- 吴玉章 1955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
- 周有光 1957 《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语文》第7期。
- 周有光 1998 《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
- 朱德熙 1988 《在“汉字问题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
- [瑞典]高本汉(著) 张世禄(译) 1931 《中国语与中国文》,商务印书馆。

(苏培成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 supeich@pku.edu.cn)

